

**摘要：**冷战时期中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的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前沿防御，即将来犯之敌歼灭在前沿地区。二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特别强调坚持诱敌深入思想，将敌人放进来打，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三是20世纪80年代，在战略指导上由“诱敌深入”转为“顶住敌人”，军事斗争准备由应付全面战争转向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

**关键词：**新中国军事史 反侵略战争 战略指导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3) 01-0015-04

Evolu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Guidance in the Anti-aggression War during the Cold War

## 冷战时期中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的演变

□ 蒋楠 丁伟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不同时期国际战略形势、国家安全面临的战争威胁以及主要作战对象的变化，制定并适时调整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防止外敌大规模入侵，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可靠保证。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的演变，对于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指导规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一、积极防御，将来犯之敌歼灭在前沿地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安全环境十分严峻。在国际舞台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严峻对峙，美国积极推行包围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不可避免地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敌视。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美国加快了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大冷战和强化遏制政策的步伐，同东南亚及大洋洲的国家或地区签订了一系列所谓“防务”条约，加紧拼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同时，美国积极扶持台湾蒋介石政权，支持其反攻大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已基本形成。

要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为此，必须着力解决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1952年4月，粟裕副总参谋长向中央军委建议：为了应付敌人的侵袭，保卫国家安全，军队系统中各自发展的混乱现象应该停止，必须使陆军的整编与装备计划、海空军和各特种兵以及各部门的三年或五年的建设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特别重要的是使整个的建军计划同整个国家的工业建设计划密切地配合起来。他认为，“必须首先确定我们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假定敌国及其进攻的方向（主要是从东北面及东面）以及次要的进攻方向等，以制订我们的作战方案（应该有几个方案）。尔后根据战略方针和几个作战方案来制订我们的国防建设计划”<sup>①</sup>。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提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后发制人、持久作战、阵地防御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要求加强战争准

<sup>①</sup> 《粟裕文选》，第3卷，7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备,采取积极措施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迫敌进行持久作战,以便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彻底打败敌人。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原则确定为:以陆军为主,在空军、海军的协同配合下,把进攻的敌人主力歼灭在中国沿海地区。战争初期的作战形式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也就是以阵地的防御战和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根据未来战争的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人民解放军必须注意提高军队质量,加强陆军建设,重点发展空军,逐步地发展海军,提高军队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的基点主要放在准备抗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上,在作战指导上采取的是前沿防御的方针,即将来犯之敌歼灭在中国的前沿地区。

## 二、加紧战备,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进行了相应调整。60年代初,中央军委判断,在未来战争中,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战略性突然袭击的可能性,特别是从空中来的、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在现代条件下大大增加了;中国不仅对于敌人的原子弹、导弹、化学、细菌武器的突然袭击要有充分的估计,同时也要考虑到敌人在中国纵深地区实行战略空降的可能性。1960年1月,总参谋部将《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呈报中央军委。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未来反侵略战争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既在浙江三门湾以北沿海地区顶住敌人,在东南沿海地区坚守要点,诱敌深入至纵深地区后聚而歼之。同年8月,中央军委在半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坚决不让敌人从中国的北方打进来,采取一切办法死守东北和山东半岛地区,这样经过一番激战之后,就势必迫使敌人不得不从中国的南面实行比较吃力的渡海登陆战。如果敌人从中国的南面进攻,对人民解放军是有利。把敌人从南面放进来之后,敌人就将遇到层层不断的山地,而人民解

放军则便于依托这些山地不断地去消耗其人力、物力,争取逐步改变敌我优劣之势。1961年1月22日至2月27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国家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会议确定,国家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防御的主要方向是沿海地区;明确战略防御中有“顶”有“放”,即北部地区为“死守”区,要“顶”;长江以南地区为“固守”区;“两广”(广东、广西)地区为机动区,可以“放”。

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军事同盟转为军事对抗;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对峙,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同时面临来自苏联和美国从北面和南面两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在安全环境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由于中苏发生矛盾,美国会乘机对中国发动战争,必须从战略上予以重视。1965年4月12日至5月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打与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备上;美国和苏联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要准备苏联参战;打不打原子弹,要放在打原子弹的准备上;迟打还是早打,要准备早打。1965年9月19日至21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召开军委座谈会,研究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由于战略立足点是准备应付大打和外国侵略者的核袭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在核时代敌强我弱的力量基本对比的情况,确定将“诱敌深入”作为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1965年6月,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sup>①</sup>。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诱敌深入”方针。他说,“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战争有小打和大打两种可能,“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sup>②</sup>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苏联对中国

<sup>①</sup>《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15页,北京,军事科学院、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sup>②</sup>《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359页。

的威胁仍然存在。与此同时,苏联全球战略部署尚未完成,其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若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短时期内不大可能。在1977年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sup>①</sup>。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是,“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战略突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sup>②</sup>。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全环境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也是军事斗争实践最为活跃的时期。60年代初中国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他战略方向不安全因素也明显增多。6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战略方向是南北两个方向,既要做好对付美国发动战争的准备,同时对苏联有所防备,充分准备独立作战和两面作战。60年代末,主要战略方向转向北线,主要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共中央、毛泽东一度判断苏联对华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迫在眉睫,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以临战姿态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在反侵略战争作战指导上特别强调要坚持诱敌深入思想,依托本土作战、人熟地熟情况的优势,将敌人放进来打,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 三、制止战争,立足于准备应付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应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原理,结合实际,深入探讨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以及反侵略战争准备问题。1979年1月,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粟裕应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的邀请,在这两个院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报告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争指导和作战方法进行了新的思考,提

出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关键问题,就是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既要避免和敌人重兵集团进行战略决战,又要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迟滞和消耗敌人,以达到保持战争能力、保存战争潜力、实现战略展开、调整和加强防御体系的目的,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使战局出现初期的相持局面,为战胜敌人创造条件。他的这一观点为新时期战略方针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粟裕的这次讲话在全军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军委总部列为全军高级干部必须学习的内容。全军很快掀起了研究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热潮。同时,总参谋部组织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研究战争初期作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问题。

1980年9月,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向中央军委呈报《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建议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仍应以“积极防御”为宜。他提出:不宜将“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列作为战略方针。因为这容易在贯彻执行中造成思想混乱。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贯穿战争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战争指导原则,即在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全国各个战场都必须贯彻执行,而诱敌深入则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过程的指导原则,不仅战略反攻阶段不适用,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对于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部队也不适用。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都对该建议作了批示,并同意所提建议。

为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中央军委提出加强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研究,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领会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研究外敌入侵时应采取的战略对策。1980年9月17日至10月18日,中央军委举办全军高级干部对苏防卫作战研究班(称“801会议”),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人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学习、领会毛泽东战略思想,分析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人民解放军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听取各总部、军事科学院和军兵种关于敌情、战争初期作战方针、战时政治工作、战时后勤保障以及军兵种在战争初期运用等15个课题报告,着重研究世界战略形势、对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sup>②</sup> 《叶剑英军事文选》,68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苏军入侵中国的判断和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等重大战略问题。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研究了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样式,对于统一全军的作战思想,提高全军高级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月15日,邓小平在研讨班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sup>①</sup>叶剑英在讲话中明确表示:“我在七七年的讲话中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次讨论,大家都主张改为‘积极防御’,‘积极防御’包括了持久作战和诱敌深入的涵义,我同意大家的意见。”<sup>②</sup>

重新调整后的军事战略方针,规定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抗住敌人的战略袭击,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掩护全军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争取初步稳定战局。这一方针在其内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是在战略指导上变“诱敌深入”为“顶住敌人”;二是在作战形式上变打运动战为主为以坚守阵地打防御战为主。战略方针的调整,解决了新形势下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对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军队建设与战备,以及今后的反侵略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人民解放军体制编制调整、武器装备发展、军事训练等各项工作改革提供了基本依据。

为了贯彻落实“801会议”精神,1981年8月27日至9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802”会议,着重集训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实施,参观了北京军区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通过集训和参观演习,对战争初期防御战役问题进行了探讨,加深了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由冷战趋向缓和。中央军委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可能的,其原因:一是有资格打世界战争的苏美两国,在军事力量上会长期处于均势,谁也不敢打;二是双方的全球战略部署均未完成,不能打;三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可以推迟或制止战争的爆发。基于以上分析,中央军委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

上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军事斗争的准备也由应付全面战争转向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对于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和综合国防能力,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实行这一战略性转变,标志着国防和军队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 四、结语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始终面临着—个强敌的战争威胁,在某一时期甚至面临同时与两个强敌或多线作战的危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制定或调整反侵略战争战略指导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始终把国家利益作为战略指导的最高原则,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实践证明,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是坚定的,说话是算数的,同侵略者的斗争是有所作为的。二是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如实施大规模“三线”建设,进行“三北”防护工程建设等,全面加强战备建设,这些举措对战争爆发起到了一定的慑止作用。三是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的战略指导地位,把争取反侵略战争胜利的立足点,放在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上。四是不拘泥于已经确立的战略指导,密切关注现代战争的动向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并制定出新的战略指导,使战略指导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形势。

作者:蒋楠,军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丁伟,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显社

<sup>①</sup>《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7、17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sup>②</sup>《叶剑英军事文选》,719页。